

中國近現代畫家叢書

潘天壽評傳

潘公凱編著 · 商務印書館



中國近現代畫家叢書

潘天壽評傳

潘公凱編著 · 商務印書館

責任編輯——黃港生

《中國近現代畫家叢書》

潘天壽評傳

編著者——潘公凱

出版者——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

香港鰂魚涌芬尼街2號D僑英大廈五樓

印刷者——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75號

版次——1986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1986 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

內容提要

本書是第一部全面地系統地研究近代已故國畫家潘天壽的著作。分傳略、繪畫創作、詩書畫印四全、史論研究、教育思想五大部分，來論述潘天壽的生平、藝術風格、藝術成就和他的繪畫理論體系。插圖豐富，與文字緊密配合，有助於對潘天壽藝術創作的構思和風格的理解。後附潘天壽年表。

“中國近現代畫家叢書”

出版說明

近現代的中國畫壇，名家輩出。他們在中國畫的天地裏辛勤耕耘，各自取得輝煌的成就。他們的美術創作，他們的成敗經驗，他們的畫學理論，都值得當代美術工作者和美術愛好者深入研究，借鑑學習。

我們出版的這一套“中國近現代畫家叢書”，其用意便是為美術工作者和美術愛好者提供參考材料，以資學習研究之用。這一套叢書的編寫原則，是將卓然成家，在國畫技法上有所創新的近現代已故國畫家的生平概況、美術創作和畫學理論作一全面的系統的評介。今天仍然健在的畫家，他們的風格可能還有所變化，他們的成就可能比目前還更大，如果現在來評價他們，恐怕是不夠全面的，因此一概不納入本叢書的計劃中。

本叢書力求做到資料翔實，深入分析各畫家的藝術風格和他們的畫學理論，對他們的成就能給予公允的評價。本叢書如有任何錯誤或不足之處，敬希讀者不吝批評，以便隨時修正補充。

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

一九八五年十月



潘天壽與兒子潘公凱



潘天壽在作畫

目 錄

一、傳略	1
童年	1
小學	4
浙江第一師範	8
鄉間教員	12
上海	16
杭州藝專	21
抗戰流離	25
新的努力	29
浩劫	37
二、繪畫創作	40
高風峻骨的風格基調	40
筆、墨、色	41
章法結構	54
格調境界	68
指墨畫	78
三、詩書畫印四全	82
四、史論研究	91
史論著作	91
藝術思想	93
中國畫的技法	96
五、教育思想	99
附錄：	
潘天壽年表	101
後記	108

一、傳略

童年

潘天壽，原名天授，字大頤，號壽者。中年以前常署阿壽、懶道人、心阿蘭若住持壽者，晚年常署雷婆頭峰壽者。

一八九七年三月十四日（農曆二月十二日亥時），潘天壽出生於浙江省寧海縣冠莊村。

寧海，是浙江省東部沿海的一個小縣。它的東北角臨象山港，東南角是三門灣；天台山脈的餘支，巍峨地斜插過縣的西部邊界。全縣大半是山地和丘陵，只有中部和東部，有小塊的平原。

冠莊，在寧海縣的中部，距縣城十華里，是一個四百餘戶的大村莊。周圍還有幾個小村也屬冠莊鄉的範圍。村莊與周圍的水田，連成一塊平坦的盆地，與縣城所在的大盆地相接。四周都有些山峯，以西面的山較高，名曰牌位山，此山背後，就是高峻的雷婆頭峯，山上全是赤松，鬱鬱蔥蔥，濤聲貫耳。潘天壽晚年自號“雷婆頭峯壽者”，即由此而來。

潘家的祖先，據說元初即已遷來冠莊，子孫漫延，成為冠莊的一個大姓。續延至第十五世，名學純，字剛甫，即是潘天壽的曾祖父。關於學純的情況，已難考，大致是普通農民。學純有三個兒子，老三名期照，為人慷慨重義氣，十分勤勞節儉，種田種得很好，他幾乎是白手起家，慢慢買進了二十來畝水田和一些山地，造了房子。他就是潘天壽的祖父。期照有二個兒子，長子名秉璋，字子陶，乳名達品，同治十一年生。他就是潘天壽的父親。後來，舊房子失火燒燬，不得不匆忙建造新屋，名曰“又新居”。這是江浙一帶最常見的一種木結構房屋，成方形，中間是一個鵝卵石鋪的天井，有點類似於北京的四合院，所不同的只有朝南的三間上面多一層矮樓。潘天壽即出身在這座屋子裏。矮樓上東面的一間，就是他幼年生活和畫畫的地方。

期照不識字，竭力想培養兩個兒子讀書。當時村中有私塾，塾中的先生，是很不差的，所以秉璋一直讀書不輟，到二十歲時，便考取秀才。秉璋是個很有個性的人，他說話不多，為人耿直，樂意為鄉親們排解糾紛，公正無私，但有時却失於主觀固執，且不善於經營謀劃。他生性慷慨仁厚，不斷接濟貧苦，有生活不

下去或一時遭難的人，他總拉回家來給他們飯吃。這類“吃白飯”的人，在他家一年四季不斷。又因他是鄉裏唯一新考上的秀才，二十多歲便被推選為冠莊鄉董（後來改稱鄉長），在鄉親百姓中有很高的威望。在冠莊附近的幾個鄉裏，他也有很好的信譽，因而曾一度被推選為縣參議員。

秉璋三十二歲那年，寧海縣出了一件大事：寧海農民舉行了一次相當規模的反洋教武裝起義。早在鴉片戰爭以後，隨着寧波被列為通商口岸，天主教即由寧波傳入寧海，傳教士成了地方上的太上皇，魚肉鄉民，教民也有許多特權，仗勢欺人，引起廣大農民的強烈憤慨。民族矛盾以宗教仇恨的形式表現得日益尖銳。這一年八月，宗教團體“伏虎會”首領王錫彤在寧海大理舉起“滅洋教”的大旗，製備槍械，殺死天主教教民數人，提出“滅此天主，以綏中國”的口號，開始武裝起義。起義隊伍迅速向縣城進發。八月十三日，王錫彤率眾途經冠莊，正值中午，受到了冠莊鄉董潘秉璋及鄉民們的熱情歡迎。秉璋對西洋傳入的天主教早有不滿，對教士與教民的胡作非為深感義憤，覺得王錫彤的起義大快人心，又加上王錫彤是和自己一同應試的同榜秀才，是老熟人，遂令村內大設筵席三十餘桌，款待起義隊伍。當時江浙報刊均有關於“寧海教案”的報導，如《滙報》云：王錫彤率眾，“午時到冠莊，該莊設席三十餘桌濟匪”。秉璋這樣做，自然是冒了很大的風險，但他是個富於正義感的忠直之人，見義勇為，是無所顧忌的。王錫彤在當日下午即攻入寧海域內，焚燒天主教堂，殺死傳教士，搗毀教民屋物，聲名大振。但不久即被寧波派來的數千清兵包圍，主要領導者除王錫彤一人逃竄外，均被殺，會民被捕甚眾。這是辛亥革命前夕浙江重要的一次反帝農民起義，在寧海鄉村得到廣大的同情與支持，但失敗得很慘烈。秉璋因在冠莊一帶深得眾望，鄉民們一致為他辯護，終於未被問罪。

這一年，潘天壽才七歲。當時潘家大院裏裏外外都擠滿了起義的農民，刀槍林立，人聲鼎沸，給幼年的潘天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究竟是怎麼回事？那麼多人幹什麼？他是弄不清楚的。直到後來逐漸懂事，才在人們的談論中，了解了那個熱鬧場面的前因後果。於是幼年潘天壽的腦子裏，萌發了“中國人決不能受洋人欺侮”這樣一種民族自尊的觀念。

與此同時，另一件給幼年潘天壽以深刻印象的事是母親的去世。

潘天壽的母親，是寧海右榜舉人周熊飛的長女，長得修長端正，天資聰敏。人很勤儉，性格又溫順，除了全部家務均由她操持外，裁衣、烹調都是能手，還綉得一手好花，喜歡描圖剪紙，聞名於村裏的婦女中。當時鄉裏女子，識字的極少，而她却能背不少詩，喜歡讀書，常給孩子們講些書上的故事，能說不少謎語。她生了兩男兩女，第一個是女孩，第二個便是潘天壽。對於第一個兒子，做

母親的自然特別喜歡，很小就教他識字，給他講故事，做燈籠，剪小人。在她生最後一個男孩時，由於產後感染而一病不起。王錫彤率衆來冠莊，她正在重病中，身體十分虛弱，看到窗外那麼多長矛刀槍，人聲喧鬧，受了驚嚇，加重了病情，一星期後就故世了。

潘天壽過早地失去了母親的慈愛，給幼小的心靈帶來了極大的悲哀和寂寞。父親對他雖然喜歡，却又很嚴厲。母親故後，父親就將他送進了村裏的私塾。塾師是同姓老秀才，瘦長個子，頗有些迂，管教很嚴，要學生處處以“聖賢”爲榜樣，只許斯斯文文，不許亂說亂動，連走路也不准走得太快，更不用說打打鬧鬧了。潘天壽剛進私塾個子不算高，但長得很結實。他不愛調皮搗蛋，也不喜歡嘰喳喳，憨厚老實。開頭兩年，他只是糊裏糊塗地讀書、背書、寫字，成績平平。到了十一、二歲，他的成績開始好起來，很快就名列前茅，私塾先生對他很喜歡，上課時，總是讓他坐在自己身邊。

私塾是整天讀書，連寒暑假都沒有，只有農忙時，可以在家幫忙，實在是很枯燥乏味的。每天放學後，孩子們才回到自己的天地裏。他喜歡捉魚，捉蝦，摸蟹，也喜歡掏鳥蛋，採野果。他還會捉鳥，用竹篩在空地裏支着，放點穀粒，有時可以捉到八哥。溪邊有片竹林，一到春天，他就去挖小筍。他還在自己掘的小塊地裏種南瓜、種蠶豆。農忙時，他便幫着家裏放牛、砍柴、車水、耘田。

逢年過節是童年潘天壽大顯身手的機會。元宵節、行燈會，他做的燈籠，是小朋友中最好看的。清明節上墳，他做的紙幡，也總比別人家的精緻。年逢乾旱，鄉民們舉行大規模“求雨”活動時，那幾家合做的求雨亭，數他做得最漂亮。端午節，女孩子們要做香袋，總是請他設計，畫花樣。做風箏，村裏也數他做的花樣最多。這些作品，總是由他設計，紮架子，姐姐和妹妹剪花、糊紙，最後再由他在上面畫上彩色的花鳥人物，合作完成的。

潘天壽對繪畫的興趣，最初就是從這些傳統活動開始的。他在私塾讀書，讀得膩煩了，便在紙片上畫小人、畫花、畫鳥。略大一點，便熱心於臨摹《水滸》、《三國演義》等小說的插圖，連鄉中祠廟門窗上的山水、人物、花鳥、蟲魚，他都一一心記而加以摹仿。他的畫常被塾師沒收，還幾次被狠狠的責打了，父親也因為他“不專心文章課事”而嚴厲地責罰過他。但他對畫畫的興趣，却非但不減，而且日益增長。他畫的畫，逐漸像樣起來。冠莊附近誰家裏有好看的畫掛着，他總一遍遍跑去看，默默記住，回家背臨出來。每到舊曆過年，他的雙腳就跑得更勤，從這家店跑到那家店，去看一張張年畫，看得連吃飯都忘了。他的畫在小朋友中間漸漸出了名，他常常將自己畫的花鳥人物分送給小朋友，尤其是他畫的將軍、和尚，最得朋友們喜愛。後來連大人們也要他畫幾張貼貼，村上的豆腐店、

糕餅店、理髮店，都有叫他畫畫寫字的。他越畫越有興味。

當時在私塾，畫畫是被禁止的，因為塾師認為畫匠與泥水木匠處於同等地位，不是“讀書人”的事。而寫字，則列為功課之一。潘天壽對寫字的興趣，大約與父親秉璋有關。秉璋喜歡寫字。在冠莊，寫字數他第一。逢年過節，婚喪喜事，別人來求他寫對子寫橫額的很多，他總是有求必應，替人盡義務。潘天壽從小看在眼裏，習以為常了。所以從私塾開始，他對於寫字，總是認真對待。在私塾，先是寫描紅格，後來寫墨寫映格，再後寫墨寫空格。潘天壽很喜歡寫字，也有持久的耐心。他每天中午比別人多寫一張字，在私塾的幾年，從未間斷。

在私塾裏，他不但喜歡畫畫寫字，還喜歡雕刻些小東西，不論是木頭、樹根、竹子、石塊，他都喜歡用來雕刻。後來為了配合字畫，又開始刻起圖章來。他當時對於金石篆刻的學問一無所知，只是隨心所欲地刻着玩。因為刻印章的石頭要用錢買，他就盡量尋找代用品。有一次走過村邊的瓦窑，受到了啓發，便試着用黏土打緊，壓成方塊，陰乾，就成了硬度介乎石頭與黃泥之間的刻印材料，這真使他非常高興，大大小小做了許多，痛痛快快刻起來。刻好以後，再放在爐灶裏焙燒，硬度就大大增加了。有紅的，有青的，顏色就像燒壞了的磚塊。但在鈐印時，太吸油，他就將石蠟熔化，在印面上輕輕塗上一層，便不再吸油，很覺適用了。有了材料來源，他就越刻越多，但因無人指點，終是盲人瞎馬，難以進步。

潘天壽在私塾讀書期間，家境已開始衰落。他的祖父去世時，留給他父親十畝另一點水田，還有一小塊山地，是個小康之家。但自從母親去世以後，父親續娶過兩個繼母，都相繼病故，接着又娶了第三個繼母。秉璋是鄉董，婚喪喜事，不能太寒酸，因而，只得一次次變賣家產，原來十畝田只剩了小半，家境日益難支。但秉璋總自信能將家產重新支起來。他曾計劃在自己的山地上發展桃園，也想在旱地裏種棉花，下了不少工本，但由於水土條件不適，又遇上蟲害，結果全部歸於失敗。潘家終於從小康陷入了困頓。

小學

潘天壽十四歲那年的春天，父親將他送到縣城的初級小學去唸書，他是插班生。小學座落在城邊關岳廟旁，附近還有一座馬王廟，馬王廟的東面，又有一座三公祠。小學的十幾個住宿生，就睡在三公祠的樓上。三公祠已很破舊，空蕩蕩的，樓上雖住着一羣小學生，仍顯得十分冷落。從初小到高小，他在三公祠的破樓板上整整睡了五個春秋。直至晚年，潘天壽對此還留有深刻的印象。

對於少年潘天壽來說，到縣城小學讀書，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因為在小學

中已經使用在上海出版的新課本，開設的課程，有格致、地理、歷史、體操、國文、算學等多種，比鄉下私塾是豐富生動得多了。而且，還有圖畫和習字課。圖畫課雖然課時不多，但已夠他興奮的了，他覺得是從私塾先生的限制反對中解放了，他可以名正言順地畫畫了，這是多美的事！由於有私塾的基礎，功課對他來說是輕鬆的，所以他可以將較多的時間用來畫畫。寫字課每周也只有兩課時，時間反倒比私塾裏少得多，而老師，也仍和塾師一樣，不加任何指導。好在當時城中紙舖裏已有石印的字帖賣；黑底白字，價錢也不貴，他看了非常喜歡，就買了一本《瘞鶴銘》和一本《玄秘塔》，利用課餘時間大臨起來。平時一有空，就到紙舖裏看看，若有新帖，總設法買到手。這對他來說，真如久旱逢春雨，給他的學習書法開闢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新天地。但是，從鄉間私塾到城裏小學，自己學習的方法是否對頭，成績有否進步，仍然茫無所知。而他對這種學習生活已經習慣，也不覺得有孤陋寡聞的苦悶，還是喜歡寫字。

除了寫字，他對畫畫的興趣也在這時經歷了一個關鍵性的轉折。潘天壽晚年曾談到：“我從十四歲起就下決心要做一個中國畫家。”正是十四歲這一年，他明確地決定了自己一生的努力方向。這固然有他從小對繪畫強烈持久的興趣為基礎，而促使他下這個決心的，却是一本從紙舖買到的舊《芥子園畫傳》。他從這本畫譜裏，才知道繪畫的範圍廣闊，分科複雜。由分部的練習，到整體的組成；由簡單的基礎理論，到高深的原則，都是由淺入深，步驟井然。《芥子園畫傳》在少年潘天壽的眼前打開了一個嶄新的天地，使他意識到中國畫是一門值得自己傾畢生精力加以研究的學科。十四歲，正是一個少年思想開始成熟的年歲，沉默寡言的他開始進行認真的思考和選擇，童年的興趣轉變為一個慎重的決心：要一輩子研究中國畫！在他憨厚平靜的笑容裏充滿了自信，初生之犢，憑着充沛的精力，開始毫不動搖地實踐自己的決心。

在縣城小學讀書，父親只能供給他最低限度的學費和伙食零用。學習中國畫所需的工具材料，自然是須首先解決的問題。紙，只能買一角錢一刀的土紙。由於紙的使用量大，儘管用土紙，也使他感到吃不消。他就盡量用清水在土紙上作多次練習，有把握了，才用墨畫。偶爾用一、二張宣紙，他是極慎重的。他曾嘗試自己做墨，開始是用煤塊，研細過篩，加水沉澱，取上層極細者曬乾，加膠壓製成塊。後來改用鍋底烟灰，沉澱加膠，反覆錘打，經過多次試驗後，質量已近市上賣的松烟。他在相當長的時間裏，都是用自製的“大墨”練習作畫的。硯台，私塾時用的一塊瓦硯太小，為了畫較大的畫，他到遠遠近近的山上去找石質細膩的岩石，背回來自己錘鑿，但因石料多不堪用，往往邊鑿邊扔。但他終於也找到過勉強可用的石料，鑿成大硯池，磨平，還在四周刻上花紋，一直使用了多年，

直到五十年代初，這大硯池還在老家的舊屋裏。他爲了寫大字，畫大畫，也自製過各種毛筆。羊毛、兔毛、豬鬃，甚至椶櫚絲，他都試過。此外如筆架、筆筒、三角尺、用具盒等，也都是自製的。後來，他還自做印泥，放假回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將自製印泥用的菜油拿到院子裏曬太陽。

在冠莊家裏，他給自己安排了一個簡陋的畫室，用一塊門板，擱在兩條長橈上，作爲畫桌，旁邊就是他的牀鋪。他將一個木箱改成書櫃，並在櫃門上親手刻了兩行工整的顏字，裏面放着他心愛的書籍。這些就是少年潘天壽的全部家檔。

他用自己的結實的雙手，創造着一切必需而簡陋的條件，帶着憨厚的笑臉，默默地，然而毫不動搖地向那遙遠的目標邁進。

學校雖有圖畫課，但教得太淺，校中也沒有擅長繪畫的人。這期間，他學畫唯一的老師，就是那本《芥子園》。課餘飯後，他反覆臨畫，細細研讀，書中包涵的內容，真是一點一滴都不放過。他不僅從中獲得了豐富的繪畫知識，而且從中悟得了詩文、書法、金石以及畫史、畫論與繪畫的密切關係。在初小的二年和高小三年半中，他不僅努力自學繪畫、書法，還在課外盡量借書自修詩文及畫史、畫論，同時，仍然不間斷地刻印。

《芥子園》是石印的，既無顏色，又無濃淡，這對少年潘天壽來說，對着臨摹常常發生許多困難。城裏也沒有老畫師可請教，只有一家親戚是讀書人，愛好書畫，到他家裏，才能看到一些用來裝飾的鄉下小名家的畫幅懸掛着。這就成了潘天壽欣賞古畫和參考學習技法的場所了。此外，在附近鄉村中，還有幾家破落戶保存着一兩幅舊畫，他們自以爲祖先留下來的名迹，不常讓人觀看。他爲了要作參考，總是托人介紹，跑一、二十里路去看。雖然有時覺得畫得並不好，但是爲了學習參考，興趣總是很高，從沒有因跑酸了腿而有所懊悔。

在看到過的這些舊畫中，也有用指墨畫成的。這些作品啓發了潘天壽對指墨畫的興趣。回家後，他自己就試着練習。此外，他還嘗試過用椶刷、筍殼、竹片等作畫。這種種嘗試自然大都沒有成功，即時放棄了，但却顯示了他喜歡創造、勤奮探索的精神。唯獨用手指作畫，他始終沒有放棄摸索，因爲這畢竟是前人走過的路，有迹可循。在縣城讀書的五年中，他或許還學過嶺南派的一些畫法，對着真景寫生，力求畫得細緻真實。但不久便覺得這種畫法與自己的興趣不合，就沒有朝這個路子走。他的沉靜而善於思考的性格，使他能在無人指導的自學環境中，在極有限的書本和參考資料中，慢慢地悟出自己所應該走的道路來。

《芥子園》，實際上是傳統文人畫的一種入門基礎書，是與文人畫路子一脈相承的。潘天壽少年時代以《芥子園》爲唯一的啓蒙老師，朝夕揣摩，手練心記，以至審美愛好，鑑賞眼光，亦自然地逐漸與文人畫的旨趣相近。所以，潘天壽在

以後的藝術道路中，能迅速深入文人畫領域，始終不變地走文人畫的路子，這雖有思想個性等多方面的因素，但《芥子園》的引路作用，恐怕也是不可抹煞的。

縣城小學的“新學”課程，逐漸將一些較先進的科學知識傳授給了這個僻遠山鄉的學生。他讀到了世界地理，知道了哥倫布、愛迪生，約略地感覺到了中國以外的整個世界的存在，約略地感覺到了中國正在經歷某種深刻的變動。進了小學，他才知道清朝是滿族人統治，因而心裏很不服氣。進初小的第二年，辛亥革命爆發，他聽到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感到十分有理。對於推翻清朝帝制，更是歡欣鼓舞。尤其是民生問題，覺得“耕者有其田”的政治綱領，真是非常之好！他對於祖國和家鄉的未來，抱着模糊而熱切的希望，以為這一來，中國可以走上國富民強的道路了。聯繫到舊書上讀過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很希望有朝一日能為國家的富強盡一己之力。然而，沉沉中國，積重難返，辛亥革命的壯舉，越過山山水水的阻隔，傳到寧海鄉村時，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只有剪辮子這一件事了。學生們也都剪了辮子，留着短髮，潘天壽却剪得很徹底，剃成整個的平頂頭。他對平頂頭是十分滿意的，因為既不用梳，洗頭也方便。從此以後，他一生到老都是剃的平頂頭，再也沒有留過頭髮。

潘天壽十六歲時，初小畢業，轉入城西的正學高小。這個學校的名稱是紀念明代名儒方正學的。方正學名孝儒，寧海人。明惠帝時召為翰林侍講學士，文章醇深雄邁，為人忠直，德高望重，明成祖篡位後被執下獄，企圖利用孝儒的威望，要他起草詔書。孝儒且哭且罵，說：“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慷慨就死。他的妻兒聞訊均自殺，宗族親友坐誅者數百人。因為他讀書之廬名正學，所以鄉人在寧海縣城建正學祠，城中建正學坊，以示紀念。方孝儒是這個偏僻小縣的讀書人的驕傲，是忠誠剛直的台州人的典型。孝儒的忠烈，潘天壽在私塾中就早有所聞，到正學高小讀書，日日走過正學坊、正學祠，先生們又時時提及這位本鄉先賢的事跡，這一切，在這個樸厚沉默的少年心裏，刻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潘天壽直到晚年，對人講起家鄉寧海，還常提到方正學，雖隻言半語，却流露着為家鄉出了這麼一個可敬之人而由衷的感到自豪。

小學五年，潘天壽從少年轉入青年時代。由於家鄉落後的環境，也由於他樸厚、沉靜的性格，他仍然像一塊質地好而未經認真加工的石頭，對整個客觀世界的認識，還是朦朧的，就像隔着冬天早晨的薄霧。在同學中間，他是勤奮好學的一個。他幹什麼事都那麼專心致志，能夠長時間沉浸其中而不覺疲倦。他每晚上總要點完一燈油才睡。畫畫，寫字，讀書，成了他最大的樂趣。農忙時回家，白天在地裏幹活，完全是作為一個勞動力使用的，自然十分勞累，晚上，仍然點燈自習到深夜。他各科成績都不錯，是學校裏少數幾個一直保持優秀成績的學生之

一。他總是一副樂呵呵的臉，身材却迅速地長高起來。

早晨或傍晚，他常去城邊野地裏走走。城東南有座躍龍山，山上樹木茂盛，十分幽靜，山頂還有座磚塔。從山上俯視，可以看到城南百步寬的洋溪緩緩流過，登高遠望，心曠神怡。他常帶着書本到山上來朗讀，流連忘返。

放寒暑假，回到家裏，他常去登山。有時是放牛砍柴，有時則單純是遊山。他除了偶爾約幾個同學一起走以外，更多的是一人獨行。他幾乎將家鄉的山都走遍了。冠莊西面十餘里的雷婆頭峯，是他最喜愛的山峯之一。登上這座山的頂峯，往東眺望，展現在眼前的是一片寬闊的大地，遠處隱隱的山脈，天邊微紅色的一綫東海水，那交織的無數纖細的田埂，和顏色不一的田畝，其間點綴着像麻將牌那樣大小的成片的黑色瓦屋頂，零散的小茅屋，還有，那淡得看不清的散發着草香的炊烟……。轉過身來，從山頂西望，却是山疊山，嶺疊嶺，高巍巍，黑沉沉，像是宇宙的熔爐裏新鍛的微帶青光的鑄鐵，參天壁立。……這一切，對於他，都是那麼熟悉，閉眼就能想見，然而他總是看不夠。他愛這羣峯，愛這無人驚擾的環境，愛這塊自己祖先世代代耕耘的土地。

他常常在這一片靜穆中沉思——一個十九歲的青年，等待着他的將是怎樣的未來呢？

浙江第一師範

正是十九歲這一年，差一點使潘天壽的理想破滅。夏天，他高小畢業了，父親把他叫到家裏，鄭重地對他說：“你不要讀書了，回家種田吧！”父親的這句話，已在心裏憋了好久，終於不得不說了出來。父親知道兒子一向勤奮好學，成績優異，確是無可指責的，但他更知道家境在一天天衰落。他企圖重整家業的計劃接連失敗，天災人禍，不斷向這個老人襲來，他確實已經無法再負擔兒子的學費了，而且他很希望兒子能在身邊作自己的幫手，挽回一家的頹勢。兒子懂得父親的難處，無話可說，沉默了。學校的先生知道了，都覺得這個學生成績好，不讓他升學實在太可惜，便紛紛跑來向秉璋勸說，建議秉璋讓兒子去報考杭州的第一師範，因為這個學校是官費，不用繳錢，連膳宿書籍都是供給的，只須一點路費及零用就行了。父親考慮了幾天，終於接受了先生們的意見，同意兒子報考第一師範，但約定：“考得取，繼續念書；考不取，回家改業。”

潘天壽捲了一條破被，捆了幾本書，帶了點乾糧，就上路了。爲了節省路費，他沒有坐象山港的小客輪，而是步行二百里，到寧波轉火車，到了曹娥，又開始步行，一直走到杭州。他第一次到省城，在一大羣考生中間，很不引人注目。

他沉默寡言，但在他的內心，求知的慾望和冷峻的現實激烈地衝突。國家腐敗，民不聊生，一個農村青年，雖有求知的慾望和為祖國盡力的抱負，却難得求學的機會。他在應試的作文中奮筆疾書，寫下了憂國憂民的感慨和獻身於民族繪畫的決心，抒發了一個熱血男兒的壯闊情懷。他的文章得到了主考先生們的一致好評，其他各科的成績也都考得很好。

他回到寧海等消息。不久，來了通知，他不僅考取，而且得了第一名。秉璋也非常高興，覺得兒子確是不簡單。命運終於沒有捉弄他，這個樸厚無畏的青年，以優秀的成績，邁出了生活道路上關鍵性的一步。

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是由清末二級師範轉變而來的。在辛亥革命後新文化潮流自北向南澎湃全國之際，該校師生是南方新運動的健將。校長是從日本留學回國的民主主義教育家經亨頤，所聘教員，如劉大白、夏丏尊、李叔同等，都是當時知名人士。自廢科舉，辦學堂，提倡教育救國以來，培養教師便是首要任務，故師範學校特受重視。一師，便成了浙江文科的最高學府。

一師招生重質量，而對年齡限制較寬，故同班中，有比潘天壽大十幾歲的。學生全部住校，教師也多住校，師生朝夕相處，關係特別融洽。學生除正課教室外，還有“齋室”，即自修室。“齋室”中，各年級學生搭配在一起，大學長帶小學生，互相關心，取長補短。一師的校風正派，空氣也很活躍，學生自己組織的課外研究小組頗多，體育和音樂演唱活動也很出色。潘天壽在這樣一個氣氛熱烈的學習環境裏，真是如魚得水，心滿意足。他更加勤奮，如饑似渴地吸收各方面的知識。因為他的理想是研究中國畫，所以他對文史等科特別用功，對於數理生物雖化時間不多，成績也很不錯。唯音樂、體育兩科，他不熱衷。球類及田徑比賽，他很少參加。演唱會則是從來不去的。但他的身心都十分健康，個子修長而結實，吃苦耐勞，精力充沛。那時的體育課為鍛煉學生的膽量，曾在操場架設一座“天橋”，一尺多寬，三丈多長，兩人來高，下面張着繩網，許多學生都不敢從橋上過。而他則無所謂，總是笑微微地在橋上攙扶別人。他喜歡走路和爬山，越是荒山野嶺，難走的山路，他越是覺得有味。長途跋涉的耐力，同學們都是比他不過的。

潘天壽在一師的五年，完全避開了吃喝玩樂和交際應酬，專心致志地學習，將課餘時間盡量用在學習繪畫、書法、篆刻等方面，從中感到無窮的樂趣。他參加了學校中的篆刻研究組織“樂石社”（後改名“寄社”），是一個認真的社員。當時，學校教員中如經亨頤、夏丏尊、李叔同等人，都對金石篆刻很有研究，且都是西泠印社的社員。學生受先生影響，一時間校中刻印者甚多，互相刻贈切磋，成為風氣。一師藏書不少，學習觀摹的印譜也多，如《陶齋印譜》、《篆刻鉅度》